

#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辩证关系

## ——从价值论的视角

杨尚勤 龚玉朝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体现在作为一种价值观所具有的主体性和时效性上,它在传承中与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进行着价值转型,并以当代中国价值观的面貌呈现。转型的目的在于价值的实现。当前,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维度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自身的价值在当代获得实现。

**关键词:** 传统文化;当代价值观;辩证关系;价值实现

中图分类号: G647.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9)01-0007-0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sup>[1]</sup>在各种文化、价值观念争相登台争夺思想阵地的今天,从价值论的视角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关系,对于运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阐述现实问题,把握价值观更新的背景,实现文化自信等,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作为一种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对于世界、人生、社会的看法,包括道德理想、精神特质、审美标准和生活态度,而这些恰表征着价值观的属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

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sup>[2]</sup>因此,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和时代性色彩。从这一层面上来认识传统文化,它的核心就是一种价值观。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抓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

第一,作为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脱离主体——人而抽象存在的。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有着各种需要、背负各种目的,从而创造各种价值。在人的价值创造活动中,主体和客体构成了活动结构的核心要素,因而,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关系入手,揭示了价值作为主体性现象的本质,这也是认识传统文化的前提。对于主体而言,“对他来说对象如何成为他的对象(客体),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sup>[3]</sup>,这里的本质力量就是人的独特的需要系统。客体要纳入主体的视野,就必须放在主体需要这个“容器”内,才能显示出“地位”和意义。坚持价值的主体性,把文化当作一种主体性现象来理解,是指价值、文化应为人而存在,物的价值为人

**作者简介:** 杨尚勤,男,山西稷山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龚玉朝,男,河南信阳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所赋予。人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是物本身所固有的”<sup>[4]</sup>，因此，物之所以具有让人愉悦、高兴等属性，有被人使用的价值，并不是物自身的尺度决定的，而是人的尺度。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言，若撇开其主体性单方面的从文化自身的含义和特性出发，就文化而论文化，就是没有理解价值作为一种主体性现象的本质。正如“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sup>[5]</sup>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鲜明指出了文化的人民性，即文化扎根于人民，本质上是“人化”，作用是“化人”，其形成和发展都是主体人的发现、创造、传承、认同，并反过来指导人的社会生活过程，正是在“人化”“化人”的过程中，文化才被赋予了生命。因此，只有把文化看作是一定主体的价值观，才能从主体的需求结构中去历史地、辩证地理解文化，才能分辨它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优点和缺点，哪些过时以及哪些需要继承，这样才能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源于主体的多元性，民族文化的共同性根据也来自于主体的共同性。不同时期、地域民族文化的冲突、交融都是以主体的差异、交往为根本基础的，正是在此前提下，中华传统文化显示出了其独有的多元复合性。总之，忽视了文化的主体，不从主体的角度去理解文化，就无法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

第二，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时效性。价值具有时效性，这是对价值作为一种主体性现象的有力肯定。一方面，价值是即时的。某些价值只能在一定时间内存续，否则就不能称作这种价值或不再是价值。比如，食物超过一定的保质期就会变质，从而失去营养价值。尽管食物营养价值的消失与食物本身的性质改变有关，但归根结底是因为这种改变导致食物本身已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主体的需要在价值关系的变化中才是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存在。另一方面，价值是持续的。有些需要是某一类主体或不同层次上主体共同的需要，这种需要所形成的价值就具有持续性。一些价值如安全、公正、和谐，之所以具有持续性，本质上说还是因为它能满足不同历史阶段的人们的共同需要。价值的时效性

体现在即时性和持续性的辩证统一，是价值在历时态中差异性和共同性的彼此关照。因而，我们在认识和阐释中华传统文化时，也应从价值的实效性出发，做好传承和创新。一方面，要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对于中华民族过去创造的、曾经存在过的文化，包括书籍中记载的文化和生活习俗中流传的文化都要认真梳理和总结，尤其是至今仍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到重要影响的文化。另一方面，则要着重揭示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对于先人的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又是怎样影响现代人的，特别是那些“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sup>[6]</sup>的传统优秀文化，使之“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sup>[7]</sup>，并“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sup>[8]</sup>。中华传统文化，总是借助于当下的解释，对当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作用而产生价值。

第三，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要适应所处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传承”这个概念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既需要“传”，也需要“承”，传和承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对于传承而言，传的一方是古人、教育者、长者和师者，承的一方则是今人、受教育者、晚辈和学生。这种代际关系规定了传者是不“在场”的教育者，他们的价值观念是被学习的对象，是“不在场”的古人要传给后代的。从民族的延续发展上看，每一代人的成长都经历了一个学习的过程，通过学习而不断成长，正是一代代人的学习、更替，传统文化才得以延续。但是也应该看到，每一代人所处的时代是不同的，古人、前代人对于人生和社会的理解，今人、后代人未必都能承下来。尤其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中，今人总是会以自身所处的实际生活需要和发展条件为根据对价值作出判断、选择，进而对原先的价值观进行添减改造，或形成新的价值观。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发生了“现代性表达”，在不断变革中

得到延续,即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在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创造性地借鉴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历史智慧和政治智慧,用以阐述理念、推动发展,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一个突出特点。正是源于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文化才获得了源头活水,才在不断变革中绵延不绝。当下,更要“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sup>[9]</sup>那种把中华传统文化当作一成不变的认识是对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解读不够的表现。

##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转型:当代中国价值观

价值观是价值方面的自觉意识,而非对需要的直觉和直观。<sup>[10]</sup>相对于价值,价值观是人特有的精神状态,是人关于价值的信念、信仰和理想的系统。<sup>[11]</sup>所谓当代价值观,就是从当下社会生活的创造者——现在的人的角度来说明一定主体的意识对于各种事物、事件价值的选择与判断,是人们认为某种社会行为、存在物的目的和过程是真、善、美或假、恶、丑的“理由”和“根据”。在人们进行价值评价、判断和选择的活动中有些行为的理由或根据不是那么明显的,而是隐蔽的,特别是在非理性的情感活动评价过程中,看似没有什么根据可遵循,但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是可以讨论和交流,并可以适用外部方法加以认证的社会意识。总的来说,价值观建立在当下思维的、观念的、具有社会共同方式的自觉水平上,它是关于社会中各种价值关系的认识,本质是对这些价值关系运动的体现,是主体在对各种价值关系进行体验性意识活动中形成的,这同时也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社会中的价值关系运动是价值观形成的现实“场景”,传统文化则充当着社会“背景”的角色<sup>[12]</sup>,诸如一定社会、组织及个人作为价值评价、判断、选择的主体,均有着特殊的社会生活阅历、个性的需求结构和知识结构,他们的价值观就是上述多种因素共同

作用而形成的,其具体的特质也只有从以上几个方面出发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对于主体而言,在其具有独立性、主动性和能动性之前,首先是一个“受体”,是被教育、被塑造的对象。前人总是希望用他们所接受的价值观来影响后人,这包括如何使用语言文字,如何理解各种标志符号,学会用既定的规矩来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等等。不仅仅是道理方面的教育,而且通过行为示范的作用,通过一定的奖惩制约,通过舆论的引导,使作为受教育者的主体形成本位意识,树立起既定要求的欲望、情绪、意志、信仰、理想等,进而形成自己的主体意识。正是对这些传统文化的有计划地学习和耳濡目染,使自然主体逐步演变为社会主体,即塑造出了能够认同既有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体。这种塑造的方式对于主体人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影响终生的。塑造从内容方面而言,就是用传统文化教育人的过程,是后人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化人”作用形成自身价值观的过程。正如“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sup>[13]</sup>那些把个人的价值观念看作是先天具有的观点,就是忽略了文化在价值观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14]</sup>这里的“历史”包含着价值观念,“条件”就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各种社会现象、制度、伦理的基本意识框架,也为人们的社会行为划定了基本范围和方向。对于一个民族、组织和个人而言,都有先天的文化“基因”,都必须在接受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理解它,然后才有对传统文化的分析、批判和改造,才能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观。所以,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评价、吸收和创新都是建立在对其接受的基础之上,是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的。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发挥的进步作用和其思想精

华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sup>[15]</sup>因而,中华传统文化对主体的影响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更不应该也不可能被“一厢情愿”地忽视甚至是否定。从这层意义上看,对于当代国人价值观的塑造和形成而言,要不要科学对待、正确坚持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必须要面对和要有效解决的重大问题。

由于现实价值关系的运动,每一代人都有着特殊的需求结构和现实问题,因此他们在作为价值主体对自身的需求结构进行判断,对社会问题进行解释,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价值选择的时候,特别当所接受的传统价值观念不能解释现实问题,选择后的价值体验和结果总是与既定传统价值观念相背离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对这些既有的传统价值观念进行重新审视,重新论证它们存在的正当性,进而抛弃一些传统价值观念,重新形成一些新的价值观念。毕竟,从价值的本质上讲,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形式只能通过主体的实践和认识的方式进行展现,此外不存在其他方式。因而,主体的直接体验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相较于传统的价值观,它起着一种判断、筛选和验证的作用;对于新的价值观而言,它反映了主体的内在尺度和实践活动的特性,是主体对其的角色定位、社会功能,包括社会活动中的权、责、利关系进行充分的认识的外射显现,是新的价值观形成的内在规定。而新价值观的形成是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价值观的,它们正是在对传统价值观的批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作为传统价值观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新文化对旧文化的替代,新观念对旧观念的反叛,是一种扬弃的过程。“扬”体现了新文化、价值观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继承,体现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弃”则是新文化、价值观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抛弃、修正,是某一传统文化发展的中断。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上,我们党始终坚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不搞以古非今、简单复古。认为

“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sup>[16]</sup>,这就必须“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sup>[17]</sup>。现行的价值观总会受到传统文化的规定和影响,这是客观存在的,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形成一定文化的鲜明民族特质。

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价值观各具特点,它们共同构成了整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全貌,这些价值观的特点也即民族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我们不能脱离整个传统文化的全貌来理解某一历史阶段的价值观,也就不能把某一时代的价值观等同于整个传统文化应具有的特征,这是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在研究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过程中,即使我们为了概括其时代特征而把当下的价值观在一定场域内归于统一体,也必须清楚,这不过是在研究方法上的需求,事实上,当代中国的价值观也往往彼此之间是异质而非同质的,有些甚至是互相矛盾和冲突的。不仅在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域,价值观存在差异,而且同一地域的不同阶层,其价值观也是不同的。关键是从哪一个层次、哪一类主体出发来对价值观进行界定,实质是合理地进行文化比较。

### 三、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实现: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任何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应对自身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都会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活模式和情感特征,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所特有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形成新的文化。这既是接受传统价值观的过程,也是不断更新价值观的过程。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转型期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结构转型,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随着个体意识觉醒,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转型的过程并非总是和平地实现,而是一个充满着价值观冲突的过程,尤其是新旧主导价值

观的整合和分化更为明显,在这一个过程中,文化是不可隔断的,并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传统文化在社会主导价值观更新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有着精辟论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看来,新价值观尤其是主导价值观的形成虽然伴随着冲突和矛盾,甚至是暂时表现出一种颠覆传统断然决绝的态势,但从文化发展的事实来看,这都不过是传统文化演进总体趋势中所呈现出的分离状态。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健全,文化自信的增强,传统文化在演进过程中出现的这种状态会被逐步克服,因而价值观的整合和分化是螺旋式上升的,总的来看,主导价值观的分化总会被新的整合所代替,整合多于分化。

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上述的状态。第一次是在孔子称作“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在孔子一生的政治追求中,把“克己复礼”作为己任,这里的“礼”指的是传统周礼,结果他周游列国而四处碰壁,至秦统一六国,新的文化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形成。第二次是佛教从外来文化逐步演化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自东汉佛教东来,至唐代发展至鼎盛,一时间信者众多,形成“中国佛教”一枝独秀,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正统形成了严重威胁。在佛教传播过程中,许多士人担心中华传统文化被其所吞没,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倒佛灭佛运动,但既没有将佛教文化灭掉,也没有出现佛教一统天下,最终是儒教、佛教、道教三教合流,实现了一次文化大融合,形成了新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后来的元朝、清朝时期,虽然少数民族借助军事实力问鼎中原,在政治上处于优势,但他们的文化并没有对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主流文化产生威胁。到了清朝末期,由于文化专制、闭关锁国、思想禁锢等因素而逐步落后于西方。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工业文明随之进入,中华文化遭遇了千年不遇的劲敌。在持续了近百年的文化较量中,中华文化处于较为弱势的一方,也一直处于守势。一方

面,我们应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在百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像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沧桑巨变一样。中国社会逐步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社会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也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人的价值观,对待家庭、国家、世界的看法都与百年前判若霄壤。另一方面,在百年间的中西文化碰撞中,我们进一步坚定了文化自信。百年来,在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sup>[18]</sup>。21世纪是一个文化改变世界的时代,“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sup>[19]</sup>“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20]</sup>尤其是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从与各民族进行交往中的对比上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中国虽然有强大的文化根基和强劲的文化发展势头,但我们不能说今日的中国已经从一个文化大国转变为了一个文化强国,也不能说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完全融入到了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但毋庸置疑的是,今日之中国,已经吸收了很多现代化的东西,在科学技术、文化思想的某些领域已经到达了世界领先的地位。继承与创新是一种辩证的统一,合理的形式将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形成文化的新民族特色。

中华传统文化是每个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服务于国家发展、个人成长进步的传统文化,人民群众是主体。传统文化要为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强大精神支撑。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时候一定要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立足于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明确这一点是很必要的。不仅如此,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人对西方文化盲目热衷,片面鄙弃传统文化的现象,试图将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于传统文化。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文化加速遗失,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面临巨大压力;二是民众对传统文化的敬畏感下降,对传统文化的珍视程度日益减弱;三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定义不够清晰,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解释不足,用传统文化关照现实文化的途径还很单一。

中华传统文化的演变与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更新总是相辅相成,文化的演变酝酿着价值观的更新,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实现,则指向了对当代中国主导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上。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三个倡导”,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作了概括。但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不断融合、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处于动态的更新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毫无疑问,中华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因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sup>[21]</sup>那么,如何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汲取哪些方面的内容就成了需要进一步探析的问题。

对于如何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传统文化,不断赋予其新时代的价值内容,让人们在已内化于心的价值基因中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如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成果,为我们如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遵循。我们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来分辨、提取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文化建设和道德培育,以此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任务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凝结,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反映。我们涵养的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而不是其他的价值观,因而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各种价值观念频繁交流和激烈竞争的当

下,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能站得住脚,能吸引人,就要有民族特色。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阶段中中国的制度安排、社会理想和文化选择都烙上了传统文化的印记。例如,把“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为邦本”等饱含民生民本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升华为党的群众路线,用“求真务实”“实事求是”来解释党的思想路线,用“民亦劳止,汙可小康”中的“小康”来论证中国实现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对“和合”“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等思想的创造性发展。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在逻辑理路、价值理想 and 标准等方面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有许多契合点,这就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注重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创新性。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为了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批判地继承,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一是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在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搞清其价值理念、鲜明特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既不能一味地否定,也不能全盘复制,要坚持阶级分析法和时代分析法,做好传统文化的扬弃,使之较好地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中;二是坚持在社会发展中不断解构和重构传统文化,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就是不断适应的过程,使其获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相适应的内涵;要根据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有借鉴价值的传统优秀文化的内涵和陈旧形式进行不断的现代化改造,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容、新表达形式。

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多方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内涵上看,我们应从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维度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的丰富的治国理政、社会伦理哲学,以及关于个体德性之教化与培养的思想。这些人文精神、价值资源,诸如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传统价值,以及爱国、守法、创新等时代价值,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积淀,代表着中华儿女独特的精神标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无论是从国家、社会、个人哪个层面出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最终都要立足于个人,都要从个人良好道德的培育出发。因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是如何让社会道德原则内化为道德主体的自觉行为,这一问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刻而独到的探讨和解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十分重视个体道德的培养,从个体道德培育的目标、意义和途径三个层面出发构建起了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其中个体道德培育的目标在于成为君子,即具备“智”“仁”“勇”三德;在儒家文化中,施政的目的在于“以道得民”“以德服民”,能够成人、成德,施政者应能够引导民众实现理想的人格,而非仅仅从经济、军事的角度为民众提供保障。因此,理想的君主应为拥有完备德性的圣贤,个体道德培育则成为“王道”之治所采取的关键路径,此为个体道德之培育作为儒家文化的旨趣;儒家文化虽以“六艺”为教,但重点不在于知识性的学习,而在于德性涵养和化民成俗之用。儒家文化关注现实,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这表现在对“礼乐”为主要形式的社会生活的高度关注。儒家文化以礼乐作为个体道德培育的基本途径,通过礼乐教化来使人向善,达到“成仁成圣”的理想目标。

总之,我们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结合社会现实,又要引入现代化的价值标准,并注重从个体德性之教化与培养方面来借鉴吸收传统文化蕴藏的有益资源。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创造性转化,达到超越以往的“新”境界,升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由此自身的价值在当代获得了实现。<sup>[22]</sup>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
- [2]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3-21(1).
-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5.
-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06.
-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9.
- [6]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9-25(1).
- [7]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9-25(1).
- [8]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9-25(1).
- [9]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1(1).
- [10]李德顺.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230.
- [11]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45.
- [12]马俊峰.价值论的视野[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502.
- [13]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 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2-26(1).
-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17.
- [15]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人民日报,2014-5-5(1).
- [16]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9-25(1).
- [17]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9-25(1).
- [18]习近平谈文化自信[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7-13(12).

- [19]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10-15(1).  
[20]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10-15(1).  
[2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164.  
[22] 王泽应. 论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 伦理学研究, 2015(1):6-10.

## Discussion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Val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Theory

Yang Shangqin Gong Yuchao

**Abstract:**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reflected in its subjectivity and timeliness as a kind of value. It adapts to requirement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arries 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value, and presents itself in the aspec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values. The transformation aims to target the value. At present, we must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and absorb the thoughts and ideas, humanistic spirit and moral norms from the individual, social and national dimensions, which are contained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cultivate core socialist values so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uld be transformed in a creative way, and its own value could be achieved in the contemporary.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emporary Values;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Value Realization